

#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阈中的“中国问题”

韩庆祥<sup>1</sup> 张艳涛<sup>2</sup>

(1. 中共中央党校 哲学教研部, 北京 100091; 2.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首要关注五个问题: 总体性上的“领域分离问题”、经济与政治领域的资本与权力问题、社会领域的公民社会问题、文化领域的理性精神与主体精神建设问题以及人的发展领域的“政治解放”问题。解决“中国问题”, 其实质就是要逐渐消解传统社会层级结构的“世俗基础”。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问题”; 世俗基础

**中图分类号:** B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 - 0246 (2008) 11 - 0029 - 04

所谓“中国问题”, 主要是指长期制约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人发展的根本问题和关键因素。哲学视阈的“中国问题”, 是特指时刻缠绕国人、必须经常面对、常常令人疑惑、深刻影响中国发展的根本问题, 以及与这一根本问题直接相关的基本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因此, “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所表达的是这样一种信念: 中国的哲学应当以改善中国人的生活、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为研究旨趣, 应当以影响中国人生活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为研究课题”。在当代中国语境中,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思想中的时代”应体现在, 从对现时代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这本大书的解读入手, 准确捕捉当代中国社会现实背后的深层“中国问题”, 然后运用“哲学方法”进行深入研究, 提炼出符合时代精神的“核心理念”, 引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健康发展。这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围绕“中国问题”进行“理论创新”。

哲学理论工作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分析“中国问题”进而解决“中国问题”。反思当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其困境主要在于: 没有科学判定当代中国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 没有准确捕捉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特有的“中国问题”及其“世俗基础”, 也没有把经验层面的问题提升到哲学高度来审视和解决。鉴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总体上没有达到时代、实践和人民所要求的水平, 当前, 迫切需要通过澄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和基本价值来“激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深层次的“中国问题”, 走向面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注重研究“中国问题”。那么, 哪些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阈中的当代“中国问题”呢? 只有符合如下条件的问题, 才能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阈中的问题: 长期存在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当今时代带有规律性的问题; 存在于当代中国社会深层、影响中国发展命运且属于中国自己特有的根本性问题; 属于当代中国发展走向和趋势的问题。依据这样的理解, 我们认为,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首要关注以下五大“中国问题”:

## 1. 总体性上的“领域分离”问题

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关注领域分离问题。领域分离主要包括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 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分离, 独立个人与共同体的分离, 情与理的分隔等。现代化进程实质上就

**作者简介:** 韩庆祥 (1957 - ), 男, 河南孟州人,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 哲学博士,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 张艳涛 (1975 - ), 男, 黑龙江庆安人,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讲师, 哲学博士, 研究方向: 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

冯平: 《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是领域不断分离的过程。在“领域合一”的前现代社会，许多领域都是混合在一起的，不存在公共生活领域和公共权力领域之间的特殊化与相互制约，只有沉默的、自在自发的私人家庭生活与集权的非理性的专制国家权力。在现代社会中，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是“领域分离”，即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分离，独立个人与共同体的分离，情与理的分离。

“领域合一”和“领域分离”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形式，与建立在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基础上的特定的经济状况密切相关。一般而言，在非市场经济条件下，其社会结构是以政治为中心的领域合一式的，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社会结构则以各领域的相对分离为基本特征。“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反映着社会中的组织与功能的混杂一体转向组织与功能的明确化和分化的过程。”可是，我们的许多领域现在还是混合在一起的，领域不分会造成某一领域力量的霸权而又缺乏制衡，从而使某一领域独大而其他领域得不到正常发展。整体上看，政治国家淹没市民社会，公共领域侵蚀私人领域，虚幻共同体压制独立个人，这已成为制约中国发展的现实问题。

从哲学角度研究领域分离问题，主要是研究现代化与领域分离的关系、领域分离的意义、领域分离的方式、领域分离的途径等问题。以哲学方式研究领域分离问题主要应关注权力与资本的问题、资本与劳动的问题、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问题等。

关于领域分离问题，学界有不同意见。一种观点强调公民社会领域应该而且能够与经济和政治领域分离，领域分离既可以降低执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又能增强社会的自我服务与自我管理，利大于弊。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公民社会不成熟、公民文化不健全、公民素质不高的情况下，领域分离弊大于利。我们认为，领域分离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必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的深入而逐渐深化，针对中国现实国情和特定历史方位，领域相对分离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都具有“释放”和“解放”意义。因为，领域杂糅是发生权力缺位与越位、权力压制能力、权力和资本共同占有劳动的重要原因之一。领域分离、合理界定政府权力与个人权利，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构建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应关注领域分离过程中的代价问题，并提出规范领域分离的基本理念。

## 2 经济与政治领域的资本与权力的问题

资本与权力的问题之所以走入哲学研究视阈，根本原因既在于权力与资本共同占有劳动造成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和自主创新能力缺乏，又在于二者是影响社会发展的两种根本力量。为什么在经济领域，至今我国许多地方仍实行的是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归根结底是缺乏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追问，为什么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显然与某些地方的权力和资本的联盟相关。权力和资本的联盟已成为产生当今中国诸多问题的深层根本原因。因此，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研究资本与权力问题。经济哲学与政治哲学的兴起就是对此的积极回应。

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不仅是现代社会生产关系中最重要关系之一，也是“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还是理解现代社会及其发展趋势的一把钥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解放了中国的生产力，但其种种负面效应与“官本位”相媾和而滋生的“资本权力”与“权力资本”，却使一些地方的资本与劳动关系日益紧张。

在中国，政治领域存在的根本问题，主要是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私利化、权力对权利的某种践踏、“能力恐慌”和政府职能的缺位与越位。当代中国，尽管也有资本的问题，但解决权力问题应先于并重于资本问题。因为今天我国出现的大量问题大多是由于政治领域至高无上的权力侵入市场而造成经济领域资本力量运作缺乏规范所产生的，权力至高无上又对权力缺乏制衡的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包括资本运作不规范的问题、“伪市场化”的问题也解决不了。

参见衣俊卿：《现代化与文化阻滞力》，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4-25页。

沈亚平：《从领域分离看我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基本走向》，《中国行政管理》1998年第9期。

从哲学角度研究资本与权力的问题，应主要研究现代化进程中权力与资本的关系、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权力获得的方式、权力获得的根据、权力行使的方式、权力行使的方向以及资本逻辑与生活逻辑的关系等问题。当代中国人应该如何正确看待资本呢？应看到，在当代中国，以资本运作为核心的生产关系尚未构成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作用，在很多方面资本“利大于弊”，其所起的还主要是对人的解放和对权力统治的解构作用。而权力本位倒恰恰对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和人的发展产生着严重消极影响。因此，我们既要批判权力和资本的结合及其对劳动的占有，更要批判权力本位。无视这些，一些学者不关注权力问题而只注重资本问题，显然是一种历史错位。

### 3. 社会领域的公民社会问题

公民社会是一个源自西方的话语、理念，是西方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西方语境下的公民社会概念是西方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的产物，具有特定的历史文化内涵。在中国，公民社会一词译自英语“civil society”，早期学者也将其译为“文明社会”、“市民社会”、“民间社会”或“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之所以走入哲学研究视阈，根本原因在于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所引发的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政府和公民的关系模式的根本变化以及政治哲学的兴起。随着经济的转轨和社会的转型，必然也必须重新界定国家、社会、个人之间的关系，给予三方合理的角色定位，以期在三者良性互动中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然而，在中国，“少数握有权柄的精英与无权无势的民众之间的这种截然分明的界限，是传统中国政治的一个明显特征。与此相应的是全社会的权威等级结构，它构造了尊卑关系的复杂网络。用普通的社会术语来说，这一权威结构与政治和经济的其他因素相结合，产生了比较复杂的社会分层体系”。这一分层体系进而滋生出“重国家轻社会”、“扬国家抑社会”和“有民无人”的传统政治思想。中国从人治走向法治、从管理走向治理的进程中，必须重构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关系，确立权利制约权力与权利保障机制，培育公民文化，提高公民素质。只有通过以政府权力制约和公民权利保障为核心的改革，才能促成公民社会的不断成熟，逐渐树立自主和自治的公民精神，通过公民社会整合凝聚改革的力量，更好地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社会领域需要深入研究的哲学问题主要有：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分、公民文化与公民意识培育、国家（政府）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制约与保障、权利对权力的制约等问题。目前，中国学者对公民社会的分析框架可分为“国家—社会”模式的两分法和“政治国家—市场经济—公民社会”模式的三分法。在研究上主要有基础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条基本路径。在公民社会内涵的界定上可分为“描述性”（是什么）和“规范性”（应是什么）两大类。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的主要代表性观点有：“社会主导说”、“政府主导说”、“良性互动说”。我们主张在政府主导下进行良性互动，具体而言就是把权力至上、权力独大的社会层级结构，转变为由市场、政府和公民社会构成的三维制衡的公民社会结构；把注重上下纵向权力控制、但对权力缺乏制衡的集权型社会结构，转变成注重市场、政府和公民社会三种力量横向沟通、相互制衡的分权型社会结构；把政府权力一种力量分化为资本、公共权力和民主三种相辅相成的力量。这种三维制衡的公民社会结构是当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

当今中国社会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公民社会不成熟，这与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传统社会层级结构有关，这种传统社会层级结构使民众缺乏平等独立的人格、创造个性和参与精神，也往往使一些个人的基本需求、合理诉求、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与保障。公民社会领域民主监督力量薄弱、民众参与程度低，是造成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原因。为此，需要改造社会层级结构，破除传统文化中对能力社会建构的阻滞力。只有通过建构成熟的公民社会，中国才能真正走出传

一般而言，“文明社会”特指与自然状态相对应而不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实体社会；“市民社会”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中文译名，使用最为流行，但这一术语在传统语境中多带贬义色彩；“民间社会”凸显的是与政府相抗争的色彩，台湾学者青睐之；“公民社会”则是一个褒义的称谓，强调公民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和对国家权力的监督与制衡，年轻学者大多对公民社会情有独钟。

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6页。

统臣民社会结构的阴影，才能开辟社会相对自主发展的新时代。公民社会虽然并不是人类的理想社会形态（它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一个异化和物化了的世界），但对中国而言，却是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之一。当然，政府对公民社会建设也需要引导和规范。

#### 4. 文化领域的理性精神与主体精神建设问题

理性精神与主体精神建设问题之所以走入哲学研究视阈，根本原因在于在现代化和市场化进程中中国人的理性缺失和主体性的迷失，在于国家与公民的关系模式发生的变化。理性是一个历史概念，在人类的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时代，理性的内涵是不同的，但理性的未来走向则是从独断理性走向有限理性和健全理性。理性固然是人成其为人所必不可少的，但人之理性乃是一种“有限理性”。

鉴于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化的主旋律是解放人和开发人，那么，当代中国以确立独立个人、独立人格为核心内容的主体精神与理性精神仍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在中国社会，由于行政权力与人情关系力量过大，造成了理性力量和主体精神式微，因而在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领域缺乏应有的科学理性设计，结果造成我们的一些发展往往缺乏科学的理性精神。鉴于理性精神和主体精神是现代性的基本内容，也鉴于当代中国正处在现代化的征途和现代化的初级阶段，因此，西方崛起背后的关键因素——理性精神和主体精神，仍是当代中国最需要的，但也是最缺乏的。

从哲学角度研究理性精神与主体精神的建设问题，主要是研究现代化与合理性、现代性与主体性、有限理性的人性基础、理性精神和主体精神培育等问题。当今中国文化的主题，从哲学角度讲主要是人的价值取向、人格和生活方式问题，主要是依附性人格有余主体性人格不足，较注重管制人不够注重解放人。时下，非理性风靡、工具理性膨胀、价值理性缺失已成为中国文化领域的重要问题。一些学者不大考虑当代中国缺乏理性精神的实际而过于批判理性，是值得讨论的。

#### 5. 人的发展领域的“政治解放”问题

政治解放问题之所以走入哲学研究视阈，根本原因在于封建文化遗毒对国人的影响依然广泛而深刻，个人独立并未真正确立起来，因而政治解放的积极意义在当代中国并未充分释放，政治解放的任务还没有从根本上完成。所谓“政治解放”，主要是指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解放出来、人从“人的依赖”中解放出来的社会革命，其主旨是使人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一些学者超越我国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仅仅站在所谓“后现代”的立场上来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大谈特谈“人类解放”而忽视“政治解放”，是值得商榷的。

从哲学角度研究政治解放问题，主要是研究政治解放的意义、动力和途径，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关系，“富民”与“强国”的关系等问题。

实际上，在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框架里，“解放”不仅意味着最大可能地摆脱外在束缚，更主要的是要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使人成其为人”（有尊严且体面），从而使人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因为，如果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被束缚和压抑，那么整个社会也必将缺乏生机与活力。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令世界刮目相看，成就取得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奉行了解放人和开发人的价值取向及其政策。当前，如何在“富民”与“强国”的统一中使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如何解决财富的“社会形式”与“私人形式”之间的内在矛盾，值得进行深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我们认为，尽管政治解放有其历史局限，因而今天也有“人类解放”的任务，但就中国现实而言，“政治解放”应先于“人类解放”。毕竟，政治解放是人类解放的必经阶段。当代中国，不彻底实现人的政治解放，不破除人才强国战略上的体制性障碍，不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中国就不可能真正由一个人口“大国”转变成为人力资源“强国”，中华民族也不可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责任编辑：马妮